

文史哲研究丛刊



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

王永平 著

文史哲研究丛刊



K236.307
W434

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

王永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 / 王永平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2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7 - 5325 - 4263 - 7

I. 孙... II. 王...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吴国(222 ~ 280)
IV. K236. 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972 号

责任编辑 李志茗

封面设计 严克勤

文史哲研究丛刊

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

王永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 (1) 网址: www.guji.com.cn
- (2) E-mail: gujil@guji.com.cn
-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 插页 5 字数 301,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5325—4263—7

K · 796 定价: 3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自序

五六年来，我比较集中地研究孙吴的政治与学术文化问题，发表了十多篇专题学术论文，最近加以整理，觉得可以编辑成一部论集，以作为备忘，题曰“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全书由十八篇专论组成，内容涉及孙吴上层政治运作、权力斗争和江东学术文化两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又可以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这里有必要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与心得作一个反省和梳理，以便更好地与学界同仁进行交流。

就研究方法和视角而言，我采用的是一种文化史观，即便研究纯粹的宫廷权力斗争，我依然注意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予以观照和分析。必须承认，首先这是受陈寅恪先生学术影响的结果。陈寅恪先生在其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讲义和《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等论文中，论及汉末孙吴时期江东地域社会的状况及其政权之性质等问题，总是从文化与阶级差异等方面加以论定。尽管从具体结论看，我似乎离经叛道，对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施政之手段及其政权之性质等方面所得结论与陈先生不同，但实际上，我确实是运用了陈先生的学术方法。记得 1997 年 9 月，田余庆先生来扬州参加中国史学家代表大会，我曾邀请先生来学校作学术讲演，在谈及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贡献时，田先生说一个学术大师的伟大，不在于其每一个学术观点是否正确，而在于他倡导和实践的学术路径和方法的影响，比如我们今天可以在不少具体问题上与陈先生的观点相异，但实际上，我们依然在运用他的学术方法。我经常读陈先生的书，难免受其影响，也培

养起自己的学术旨趣,但有时所得出的看法与所崇敬的大师不尽相同,也难免有所疑虑,几年来我能坚持下来,与田先生当年的讲演不无关系。无独有偶,最近我看到葛兆光先生的一段话,颇有同感:

最近我跟一些朋友聊天,常常讲“历史学家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想象力”。最近,我看黄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我认为,黄先生很了不起,他对陈寅恪先生很多具体论断和史料应用的批评是很对的,但是反过来说,陈寅恪先生对于隋唐很多历史因果关系,是有很丰富的想象和连缀的,陈先生史料功夫很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的想象力和大视野,他用这种想象和视野,使得那些史料有了一个框架式的历史解释,后来的人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在他的如来佛手心里,这就是大学问家。(《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笔谈,刊于《读书》2005年第10期,第122页)

兆光先生的话很值得玩味,一个后学,如果硬是在具体问题上与“大学问家”较劲,有时候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还是要将功夫花在学习和体悟前辈大师的治学方法上。

其次,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田余庆先生的《孙吴建国的道路》和《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兼论孙吴的江东化》等论文,是陈寅恪先生之后,在孙吴政权之性质及其社会政治变迁等学术问题上所作出的最富价值的论断。依我的理解,田余庆先生对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的考证,实际上是纠正陈寅恪先生的看法的。更为重要的是,田先生揭示出孙吴立国之初,对江东儒学大族的诛戮政策及其变化过程,可谓发千古之覆,那些零散的资料,经过田先生的梳理,成为有条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使

们可以进一步重新理解孙吴政权之性质。而他对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的细致论述，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出了当时孙吴政局变化和人事更替的不少真相，进而可以予以具体和深入的研究。

另外，唐长孺先生的《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等经典论文同样给我很重要的启发，这不仅在于二文直接涉及汉魏之际江东地域学术文化风尚及士风等问题，并提出了不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点，而且在于二文重视从特定的地域视角观察问题，并注意不同地域间文化差异及其互动关系。研究中古时期的历史文化，这是一个有针对性的重要的学术方法。

以上对三位“大学问家”的论著及其研究方法的理解，只是我的一孔之见。由于我的肤浅，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到他们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精华，但对我来说，确实是获益匪浅。我正是运用这些方法，去整理相关史料，梳理孙吴政治与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变化轨迹，并进而揭示其真相与本质的。

《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原刊于台北《汉学研究》2003年第1期)借鉴陈寅恪先生分析魏晋统治者阶级身份及其政权性质的方法，利用孙吴统治者生活情趣、婚姻观念、文化政策等方面的资料，结合相关政治运作的研究，认为孙吴统治者出自非儒家之寒门，其思想与政策都与儒家学说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别和深刻的冲突。《论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原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主要分析孙权崇尚法术和集权，与儒学朝臣的德政主张存在差别，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对抗，使士大夫阶层不断遭到打击。《孙吴后期皇权的运作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以孙晧强化皇权及其与士大夫的斗争为中心》，比较细致地分析孙权之后孙吴政局的变化过程，以为孙亮、孙休

时期,出现了所谓的宗室政治与幸臣政治,成为特定时期皇权的变态形式;孙皓上台后,逐步恢复起皇权专制的局面,效仿乃祖孙权的做法,对儒学士大夫进行了残酷的打击,造成了人心的疏离与背弃。以下有关孙权“报聘辽东”问题、吕壹案与校事制度问题、孙权立嗣问题等,皆为具体事件的考述,通过这些对孙吴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的深入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对孙吴政权特质的把握。此外,有关张昭、顾雍、陆逊、诸葛瑾与诸葛恪父子、步骘及吴夫人、全公主等人物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诸人命运的浮沉及相关历史真相,而且可以比较生动形象地认识孙吴政权的本质特征。

综上,就孙吴政治而言,富春孙氏之阶级出身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似,皆为非儒家之寒门,孙权施政的核心是“以独任为能”,其相关政策都是直接导向集权专制的。特别是他称帝之后,对儒学士大夫代表人物多加打击,明确表示其最钦佩的政治人物是曹操,自然要效仿其政治措施。经过数十年间有计划的一系列政治打击,孙权清除了儒学朝臣中的主要代表,从而确保其身后孙氏统治的沿袭,避免出现类似曹魏中后期那样的权臣当政与王朝更迭。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权的法术思想及其实践,在某种程度甚至比曹魏还要严重和苛酷。直到孙吴之末,亡国之君孙皓仍然牢固地控制着政权,这一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就孙吴政治中不同地域士人派别的分化及其斗争问题而言,一般说来,将其划分为江东本土大族集团与江北流寓集团,二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与斗争。其实,在实际政治运行与历史发展过程中,情况似乎要复杂一些,并非那么简单。孙吴上层可以分为三种力量,一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孙氏皇族宗室力量,这是孙氏统治者最信重的,孙权后期安排的执政者,其核心是其女全公主为代表的宗室人物;二是流寓人士;三是江东大族人物。后两类构成孙吴的士大夫群体。江东大族具有乡里社会的

基础,力量较为雄厚,敢于坚守儒家德政立场,在孙吴政权“江东化”过程中,一直强烈要求孙权深化政治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冲突,及至孙皓时期他们依然如此,这使得他们成为孙吴历次政治斗争中遭受打击最严重的对象。相对而言,流寓人士丧失了乡里社会,在江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对孙吴皇权依赖性要强一些,尽管他们在“江东化”过程中与江东大族人物不断融合,但毕竟存在隔阂,孙权在军政人员配置上很注意利用他们牵制江东人物;即便他们在一些政治事件中与南人持同样的立场,孙权在处置时也注意袒护他们。

不过,对孙吴流寓人士也不可简单地或笼统地视为铁板一块,由于年辈资历、文化背景与社会阶层诸方面的差异,他们又可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既有联合,也有抵触。具体地说,一方面北人可以划分为儒学文士与武人或豪杰二类。以张昭为代表的儒学名士与年辈稍晚的周瑜、鲁肃等权谋之士,在文化品格与政治观念上明显不同,导致他们在孙吴建国方略上的分歧与冲突。不仅如此,即便在北人文士群体中,由于文化层次的不同,其心态也有异。如张昭为汉末名士,纯正的儒者,与江东旧族观念一致,随着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的发展,其政治态度与江东儒学大族逐步趋同,对孙权的批评十分激烈,以致其本人受辱,后来家族遭到迫害。而其他北方文士,如诸葛瑾、诸葛恪父子与步骘等人,皆出自“单家”,本为寒士,虽与江东大族保持协作的关系,但与孙权的关系始终比较密切,对其极权专制采取温和的态度,且时常充当其牵制或打压江东旧族的工具。孙权末期,先以步骘为丞相,后以诸葛恪为首辅,这与同时江东大族主要人物遭诛,大部分人被压制的情况相比,其处境的差别确实是明显的。以上对孙吴时代所谓南北政治利益集团的认识,在前贤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有所细化和深入,具体论证见于各篇专论。

作为一部有关孙吴政治史的专论,对一些以往人们不太注意的历史细节与历史人物也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考述。如有关孙坚吴夫人、全公主、太子孙登等,通过对他们行事的论述,可以更准确地认识孙吴历史的真相,并对以上总体认识多有助益。因此,本书以附录的形式排列在相关的事件与人物之后,尽管在资料征引与观点阐发上或有重复,但并非为了显示作者的细读史书与考证发微的“功力”,更非画蛇添足。其实,在我看来,其中有些人物在特定的时期,曾对孙吴历史进程发挥过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本论集的最后一部分是有关孙吴学术文化的专题研究。《孙吴时期侨寓士人之文化贡献考略》(原刊于《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一文,针对以往谈流寓士人多从军事、政治斗争着眼的情况,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论述孙吴时期流寓之士的学术文化素养及其在学术著述与教育诸方面的业绩。《孙吴学术文化风尚考论》(原刊于《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一文虽然总体上论述了孙吴时期学术领域的发展情况,但核心是论述本土学者与流寓学者之间在经学风尚方面的差异及交流。汉魏之际,中土学风大变,其关键在于“变今从古”,今文经学日趋式微,而古文经学正蔚为主流。与此同时,江东地区作为当时学术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虽有古文经学的学者,但其主流学风依然因循着汉代以来的今文经学。相反,流寓学者虽不乏今文经学的学者,但其主流则是倾向古文经学的。随着孙吴学官制度的逐步完善,在流寓学人的影响下,江东地域的今古文经学风尚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融通。当然,在江东旧族的家学之中,他们依然保持着固有的学术传统。《读〈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韦昭〈博弈论〉推论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一文,通过孙吴中期太子孙和东宫中围绕博弈问题的争论,分析当时孙吴统治集团中对待游娱的雅俗观念的冲突,进而进一步分析

其中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域士人游娱观念的差别。概而言之，孙和作为孙吴统治集团第二代人物，受到了比较深入而系统的儒家礼法观念的教育，其思想与情趣明显士大夫化，崇尚儒雅的娱乐方式，对僚属热衷于博奕颇多不满；不仅如此，考察当时的博奕之士，多为流寓之士，而江东旧族人物则多与孙和态度相同，对博奕采取轻视的态度。这体现出南北士人的深层的文化差异和流寓人士比较独特的生活状态，考察和辨别这些差异并非仅仅在于说明这一问题本身，而是希望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前述他们在政治态度与学术风尚上的表现。

以上对本论集诸文的内在学术思路与核心观点，以提要的方式作一概括和抽象的陈述，以介绍我对孙吴政治与文化的研究心得。古人治学崇尚考据、义理与辞章的完美统一，我虽心向往之，但实不能至，往往沉浸于繁琐的具体考述，从而妨碍了学术思路的梳理与提升，难免使人越看越糊涂。因此，写下以上文字，略作“义理”之表述，且权充作序言，并诚恳地欢迎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目 录

自序.....	1
论孙权父子之“轻脱”	
——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考析.....	2
三、孙氏不重儒学与礼制.....	7
四、孙氏婚姻之“不计行辈”与“因爱登后”.....	13
五、孙氏之好驰猎、喜滑稽与酗酒.....	17
六、孙吴政权与儒学世族阶层之间的政治冲突	24
论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	31
一、问题的提出	31
二、孙权之崇尚法术及其与儒学朝臣的思想分歧	32
三、孙权对儒学朝臣代表人物的排斥与镇压	38
孙吴后期皇权的运作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间的冲突	
——以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士大夫的斗争为中心	52
一、孙亮、孙休时期的孙吴宗室政治及其斗争.....	53
二、孙皓时期孙吴皇权的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冲突 的加剧	60
孙权“报聘辽东”及其与朝臣之冲突考论	

——兼论孙权的统一愿望及其实践	85
一、嘉禾二年孙权“报聘辽东”及朝臣的抗议	86
二、孙权“报聘辽东”之潜在动机及其与朝臣斗争 之性质	95
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其性质考论	103
一、引言：吕壹被诛与孙权罪已	103
二、吕壹兴造之冤狱及儒学朝臣的抗议	105
三、孙吴之“校事”制度及其实质	113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	
——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120
一、太子孙登“常有欲让之心”：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	121
二、“二宫构争”：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之争	124
三、“二宫构争”中两派的主要成员及其倾轧	128
四、对“二宫构争”性质的辨析	136
附：论孙权太子孙登与世族朝臣之关系及其政治境遇	
——对孙吴时期一段隐晦不明的史实的考析	143
一、孙登与儒学士大夫的交往及其“德兼于能”的 表现	144
二、孙登之“常有欲让之心”及其深层原因考析	155
张昭政治地位的变迁及其与孙权冲突的原因	162
一、张昭在孙吴政权草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	163
二、张昭与孙权在对待曹操及孙吴军事战略问题上 的分歧	169
三、张昭之不得为相及其政治地位的进一步下降	175
四、余论：张昭性格的文化意蕴及其对孙吴学术文化 的贡献	179
附：孙坚吴夫人事迹考	185
一、吴夫人救护江东名士，减轻孙氏兄弟与江东大族	

的冲突	186
二、孙权临政之初，吴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	188
三、吴夫人在有关是否纳质曹操问题决策中的作用	190
顾雍论——兼及吴郡顾氏家风的形成与特质	192
一、顾雍为相之原因及其意义	193
二、谨言慎行与刚柔相济：顾雍的为政作风与实践	199
三、顾雍在吴郡顾氏门风传承中的作用	210
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215
一、陆逊为将之深层政治原因与意义	216
二、陆逊与孙权之间政治观念的差异及其冲突	221
论诸葛瑾、诸葛恪父子的活动及其对孙吴政局的影响	
——以孙权后期政局变化为中心的考察	235
一、琅邪诸葛氏之南徙及其家族门第问题	236
二、诸葛瑾之谦谨及其与孙权之关系	240
三、诸葛恪兄弟轻脱戏弄之事及其文化意义	244
四、黄武至赤乌年间孙权对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动	249
五、建兴年间诸葛恪主持的政治改革与北伐及其失败原因考析	256
临淮淮阴步氏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述论	271
一、步骘在孙吴的活动及其士人品格	272
二、孙权步夫人争后及其对孙吴政治的潜在影响	282
附：全公主对孙吴政局变化的影响	288
一、为其母争后，并迫害其对手	288
二、孙权末年及孙亮时期政治权力的实际操纵者	292
孙吴时期侨寓士人之文化贡献考略	298
一、汉末北方文士之南徙及其“江东化”	298
二、侨寓士人代表的文化修养及其兴学传教	304

三、侨寓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辞创作	309
附：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	319
一、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考	320
二、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治	325
三、广陵人士对孙吴学术文化的贡献	333
孙吴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338
一、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政策	339
二、孙吴时期侨、土学者经学风尚的异同	348
三、孙吴之史学、子学、小学及术数	364
读《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韦昭《博弈论》推论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	375
一、正统与鄙俗：孙和、韦昭的儒家游娱观念及其对俗文化的批判	375
二、雅俗之变：孙和思想的儒家化与孙吴中期雅俗文化的冲突	377
三、南北分别：由游娱观念的不同看孙吴侨、旧士风的差异	381
四、对孙吴侨、旧士风差异原因的简略分析	388
主要参考文献与引用书目	394
后记	400

论孙权父子之“轻脱”

——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

一、问题的提出

汉魏之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当时统治阶级上层的更替及其社会阶级的差异。陈寅恪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曹魏统治者出自寒门，曹氏代汉引发了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风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而西晋代魏，则使历史重回世族统治的轨道；蜀汉虽在政治、军事上与曹魏相抗，但其统治者之阶级出身及其政策则与曹魏相似。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论断，揭示了汉晋之间历史变革的本质。不过，陈先生论及同时的孙吴政权则说，孙吴统治者出自“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其“政治社会的势力完全操纵在地方豪族之手”。他在一段结论性的表述中指出：

魏晋统治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魏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寒族，非儒家。与之相同的是蜀国的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服膺儒家的豪族，与之相同的是东汉、孙吴统治者的社会阶级。另有袁绍。东汉、袁绍、孙吴、西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相承的。魏、蜀的出现与灭亡，反映了豪族儒门统治的动摇与稳定。社会阶级的

不同，决定了魏、蜀与东汉、袁绍、孙吴、西晋不同的政治特征^①。

确实，吴、蜀两国政治存在着差异。对此，王夫之已有所察觉，他在《读通鉴论》卷一二“晋惠帝”条之七指出：“孙氏之不足与言治理也，而未尝立一权谋名法之标准，则江介之士民，犹且优游而养其志。诸葛公贤于孙氏远矣，乃尚名法以钳束其下，人皆自困于名法之中，而急于事功以为贤，则涵泳从容之意不复存于风俗，安所得高视远览以曜于贞邪逆顺之大者哉！诸葛之张也，不如孙氏之弛也。孙氏不知道而道未亡，诸葛道其所道而道丧。……申、商法行而民有贼心，君子所以重为诸葛惜也。”王夫之所谓“孙氏不知道而道未亡”，是从儒家的角度立论的，实际上指出了孙吴政治有暗合儒家的一面。

不过，应该指出，上引王夫之和陈寅恪先生所论仅指出了孙吴政治的某一方面的特征，细究其实，无论是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还是其施政之手段与用心，都多与同时的曹魏与蜀汉相似，而与西晋有异。此事虽小，惟关乎孙吴政权性质的理解与认定，故有必要深加考论。当然，我们所采用的依然是陈寅恪先生剖析魏晋时期社会性质的变迁及其表征的方法。

二、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考析

关于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①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 1987 年版，第 31 页。另外，陈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等论文中也有相同的表述。诸文皆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载：“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少为县吏。”注引《吴书》又载：“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蔓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陈寅恪先生正是根据“坚世仕吴”的记载判断“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土族”。通行的断代史、教科书多采用这一说法，并以此作为论证孙吴政权性质的重要依据。但是，读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旧史中记载的历代帝王的谱系、出身情况未必真实可信，一些出身低下者，总是想方设法将其身世神秘化，或说成为历史上的名人之后，目的是抬高自己的地位。前引有关孙坚的情况亦可作如是解。孙坚自称为孙武之后，但找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故陈寿记为“盖孙武之后”，表明他是有所怀疑的。至于《吴书》称“坚世仕吴”，附之以神怪传说，显系编造。《吴书》出自吴国史臣韦昭诸人之手，他们修当朝历史，不得不有所虚饰。陈寿在《孙坚传》末直言“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实际上否定了《吴书》的记载。陈寿是三国时人，所论当可信。

关于孙坚先世的情况，《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孙钟，吴郡富春人，坚之父也。少时家贫，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沈约《宋书·符瑞志上》载：“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二书所载孙钟事大体相同，然一载钟为坚之祖，一载为坚之父。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四记此事，亦以钟为坚父。由诸书所载孙坚祖、父辈的情形，完全是寒门，而非世代仕吴的官宦之家。这一故事广泛流传于东晋南朝，说明当时人多确信无疑。

其实，对孙坚之出身卑微，当时江东人士是很清楚的，这由其婚姻之事可以看出。据《三国志·吴书·孙坚吴夫人传》：“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